

东方名家

2011.9.9 星期五

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立场



观念平台

庄迪澎 《独立新闻在线》
创刊总编辑 (2005~2011)
teckpeng@mediamalaysia.net

邓章钦的政治对手掏钱买报纸，却未能从中听其言、观其行，难以知己知彼。邓章钦选区的选民掏钱买报纸，却未能从中评比邓章钦和政治对手的政见与政绩，其在选举时做理性选择的权益实际上也被侵害了！

当我们说报社「封杀」批评者时，不是指在某些争议性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政府当局迫使报社将异议份子的论调消音的做法（虽然此举是应该谴责的），而是指报社自主且持续性地不让（或有限度地让）批评者或他们不喜欢的人和团体在他们管理的报纸上「亮相」，例如剪裁掉杀对象的名字和照片，作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种惩罚手段。

这种封杀恶行，行之有年，只是昔日因报社之间有互不点名批评的默契，以致多限于口耳相传，几无在公共论坛里公开议论。晚近由于民联雪兰莪州议会会议长邓章钦今年6月28日在古晋发表《报业风云半世纪》推介礼上批评了中文报业之后，遭世华媒体集团旗下报纸围剿和封杀，加之互联网上以剪报指证历历，报社封杀批评者之恶行再引起非议。

「奶水论」狂妄无知

持平而论，在南洋报业控股遭《星洲日报》业主张晓即兼并之前，《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并不好围剿和封杀之道，可惜被兼并后却变了样。

世华媒体集团封杀邓章钦，姑且只举两例：一，7月12日，邓章钦主持雪州议会时将两名违规的巫统议员逐出议会，《星洲日报》报道此事时却只字不提邓章钦的名字，甚至「议长」二字都略掉。二，7月20日，邓章钦在古城为「709黄道吉日之行」座谈会主讲，《星洲日报》和《中国报》的报道皆不提他（前者也不提曾撰文批评该报的另一名主讲人林宏祥），新闻照片的取景也巧妙地避开邓、林二人，仿

八方论见 · 陈勇健

南京大学文学士

许子根透露民政党将在沙巴州东山再起，估计将是场政治苦旅。此乃逃避之举，抑或掩人耳目、声东击西之计？

民政党在沙巴拉拢的三名独立议员，除了陈树杰与区锦华是不苟同沙巴进步党退出国阵而退党者外，尚有一名彭恩荣本是友党自民党议员，因自民党高层表态杯葛沙首长慕沙阿曼而退党。民政党于308大选丢了槟州元气大伤，唯有凑足人数以期卷土重来，尤其以官位者为甚。例如陈树杰与彭恩荣均为沙巴副首席部长，可惜加入民政后即遭撤消。

时评人谢诗莹认为，民政进军沙巴不易，三名议员当初并非在民政旗下中选，

民政党进军沙巴

加盟民政党本身意愿，显然民政党渡难有作为。沙巴何止有种族政党组成的铁三角，除巫统、民统、马华等，挂多元招牌的国阵成员党已有团结党和自民党，又得面对本土反对党沙巴进步党。先不论民联的竞争，民政想多分杯羹，还得经过国阵友党一致同意，否则民政再插一脚，议席分配将导致大混乱。

既然有信心取槟州，民政就应当稳守槟州，而非将注意力分散至遥远的沙巴。民政生长于槟州，槟州是该党前线城市，根基也最稳固；虽说民政要透露露会以槟州为主，但从言语中已听出有「东迁」之嫌。槟民政青年团长胡栋强指出，民政效仿行动党天兵，把槟城出色的领袖移到

沙巴竞选。不难猜出，民政固守槟州已无望翻天，倒不如开辟新战场，重新出发。

为何选择沙巴？许子根认为民政先于沙巴东山再起。既是说，沙巴仅是民政的跳板，待基础稳定再从槟出发。为何不是其他州属？或许半岛的国阵议席早已分得七七八八，民政又于308惨败而不再受看好，议席也将重新洗牌；砂州则门都没有。因此，沙巴是最好的选择，民政可能相中了沙州政局之不稳定，且又以跳槽政治出名，山高皇帝远；再加上有三名「青蛙」护航保驾，天时、地利、人和皆有。

但这么做却是兵行险着，唯恐党命不保。不仅遭到沙友党排斥与报复，槟州民政也会处于弱势，恐将一并被消灭殆尽。进退两难之际，民政何去何从？后路已被民联斩断，前途依然渺茫，走错一步，全盘皆输，民政准备好去冒险了吗？

报社恶行侵害读者权益

——新闻自由论衡（六）



圆满的要素。定时投书的读者，都是使媒体内容得以邓章钦等新闻主角、专栏作者，甚至不

佛当晚只有刘镇东单独主讲。

报社以封杀手段惩罚批评者，与政府打压异议份子或找个口实让异议份子因言获罪，恶性相当。

媒体虽是个别业主或若干股东所有，但以其作为社会公器的特质而言，封杀批评者是狂妄滥权的表现，也凸显了媒体与阅听人权力严重失衡（媒体大、阅听人小）的现象。

权力失衡的原因之一，是市场上可供替换的选择太少；媒体所有权集中乃至垄断之后，失衡程度更严重。由于竞争对手少且弱，不足以形成可观的制衡力量，占据庞大市场份额的媒体无惧被取代——不论是阅听人近用资讯的选择，或是从政者、评论人、知识分子近用发声的选择，都极为有限——故可骄纵地宣称，它报道某人某事，是对被报道者的一种「恩赐」，对方理应「感恩」。

世华媒体集团在今年7月发表围剿邓章钦的文章中，就一再祭出「奶水论」，指责邓章钦和其他批评者喝中文报的「奶水」长大，却忘恩负义地批评中文报；例如本应代表全体同业，却已沦为世华媒体集团高阶编辑俱乐部的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在7月1日的文告中就批评邓章钦「有今天的地位和知名度，就是因为华文报章长久以来对他的相关新闻如实报

道：我们不期望他感恩，但我们万万想不到他会过桥抽板、恶言相向。」

这种似是而非的「奶水论」，反映的是狂妄又无知的心态，把报社摆到至高无上且俨然全能的高度，人人皆需依赖它方能立足之地——当律师、州议员和议长的邓章钦有今日的地位和知名度，全赖它旗下报纸，与他的才干和努力毫不相干。显然，封杀恶行反映了媒体主管们的权力欲望，就像暴发户借著炫耀财富来宣示自己的财力那样，借著惩罚批评者来宣示自己的权力。

媒体和新闻人物共生互惠

媒体主管经常把访问某人或邀请某人上节目，视为给对方免费宣传（电视台和电台邀请嘉宾上节目，不给「通告费」，通常就是此心态作祟），就是前述心态的体现。若说被报道的对象或受邀上节目的嘉宾，确实因为多一次的媒体曝光而更为人所知，媒体何尝不因访问或邀请此人上节目而使其篇幅/时段得到充实，及阅听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进而拉高了读者人数和收视率？

就经济面而言，媒体特殊之处是它在二元产品市场（dual product market）中营运，一方面向阅听人出售媒体产品（媒体内容），另一方面则向广告商出售阅听

人的时间。报社的主要盈利来源是广告收入，而不是报纸零售收入，而广告业绩之良窳，则取决于读者人数和发行量的多寡。

在一般情况下，读者买报纸的主要动机是要阅读新闻，而不是看广告；报社要争取最多读者（以换取最多的广告收入），应增加或充实其内容，包括满足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对不同阵营新闻的欲求。编采人员虽是媒体内容的产制者，被采访或报道的新闻主角、提供新闻材料的消息人士、专栏作者，甚至不定时投书的读者，都是使媒体内容的产制得以圆满的重要元素。以邓章钦为例，他身为一名资深从政者和议会首长，具有吸引读者掏钱买报纸的新闻价值（newsworthiness），使其成为重要的新闻来源和材料。

因此，读者买报纸的钱，有一部分是用来购买他们所欲的邓章钦的新闻；报社作为内容供应商，报道邓章钦的动态是为这些读者供应他们所欲且应获得的财货，以换取他们继续购买本报，而非购买能满足其需求的其他报纸。是以，「邓章钦受惠于媒体」的说法只是「说一半不说一半」，较正确的说法是媒体和新闻人物之间有一种共生互惠（symbiotic）关系，媒体也受惠于新闻人物——否则，西方媒体岂会愿意砸大钱换取一些新闻人物授权独家专访？

报社封杀邓章钦，不与其名字、照片、动态和言论见报，实乃侵害读者权益。邓章钦的支持者掏钱买报纸，却未能从中了解其言行，难以和其他同道沟通；邓章钦的政治对手掏钱买报纸，却未能从中听其言、观其行，难以知己知彼。邓章钦选区的选民掏钱买报纸，却未能从中评比邓章钦和政治对手的政见与政绩，其在选举时做理性选择的权益实际上也被侵害了！

以此论之，报社「封杀」批评者之恶行，兹事体大，它既不是报社主管的合理权力，更不是报社主管和被封杀者之间的私人恩怨；有见地的读者，不应姑息此恶行，反之应自觉地捍卫自身权益才是。